

鲁迅杂文选析

第一集

一九七〇年級工农兵學員

I 210.97

厦門大学中文系

毛主席语录

魯迅，就是这个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战綫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的两句詩，“橫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这里就是說敌人，对于无論什么凶恶的

敌人我們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說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魯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魯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辯証法。

目 录

《未有天才之前》	1
《纪念刘和珍君》	5
《写在“坟”后面》	10
《文学和出汗》	16
《文艺与革命》	24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30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0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45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51
《上海文艺之一瞥》	55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63
《“友邦惊诧”论》	70
《答北斗杂志社问》	75
《论“第三种人”》	80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87
《战略关系》	92
《中国人的生命圈》	96
《为了忘却的纪念》	99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106
《捣鬼心传》	111
《拿来主义》	116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21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25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132
《半夏小集》	137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42
《死》	147

后记

《未有天才之前》

《未有天才之前》是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演讲，后由作者编入《坟》。那时，胡适之流已经从新文学阵营分裂出去，充当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文化走狗，竭力地反对和扼杀新文化运动。他们提出“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鼓吹孔孟之道，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阻止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对抗新文化运动，复活封建文化，残害人民。与此同时，文艺界又出现了“崇拜创作”和鼓吹创作需要“天才”的倾向。鲁迅针对这种种危害新文化运动的错误倾向，展开了无情的批判，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推动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鲁迅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针，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群众的作用。他针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高喊中国缺乏“天才”的论调，阐述了“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指出群众的伟大力量。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正确地指出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没有群众，就没有天才。群众创造了历史，也造就了代表千百万人民利益的天才人物。他把天才比作“花木”，把民众比成“泥土”。他说：“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英雄人物如果脱离群众，违背群众的意志，将被时代所淘汰，人民所唾弃。所以“花木非有土不可”。鲁迅这些闪烁着唯物主

义光芒的论述，有力地回击唯心史观的奇谈怪论。

群众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然也是文艺的主人。据此，鲁迅认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他说：“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这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他坚决反对依靠天外飞来、凭空产生的所谓“天才人物”去发展新文化运动，他说：“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根据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观点，鲁迅认为只要群众勇于革命实践，发扬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都可以。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才能向前发展。

为此，鲁迅对于危害群众的谬论深恶痛绝，他用形象的语言指出，那些谬论的害处在于“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妄图危害新文化运动，必须加以批判。

鲁迅批驳了胡适之流的“整理国故”的反动论调。胡适之流鼓吹这种谬论，目的在于利用孔孟之道，把青年和知识分子引入脱离人民，脱离革命斗争的邪道，祸国殃民，危害不浅。鲁迅指出：“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鲁迅还痛斥了“崇拜创作”论。这种论调是“排斥外来思想”，“抬上国粹”，毒害人民，使人民“缩进旧圈套里去”。此种论调同“整理国故”是一路货色。正如鲁迅指出的，这是要“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

鲁迅还批判了创作需要“天才”论。他指出这种谬论危害性极大，在于扼杀新文学的“嫩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这种谬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破烂货，其恶劣作用在于否定群众作用，反对参加革命实践。鲁迅号召必须同它进行斗争。

鲁迅写作这篇杂文时，虽然还没有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然而，由于鲁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能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实践的重要性，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诘问入手，直截破题，逐层分述，透彻有力，是这篇文章写作方法的显著特点。本文开头，就提出问题，即“未有天才之前”，应该注意产生“天才”的群众。其次，说明“天才”与群众的关系。再次，对那些危害“天才”在群众中生长发展的谬论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最后提出依靠群众造就天才问题，照应开头。这样布局方法，步步深入，围绕论题，论证透彻，分析有力，充分地表达作者思想观点。

这篇作品用独特和新颖的比喻说明哲学道理。如用“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说明天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的；用乔木和好土、拿破崙和士兵的关系，来说明天才与群众的关系；用“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说明天才离开群众便一事无成。这些哲学道理，借助形象比喻，使人难于忘怀，又获得深刻的教育。

鲁迅这篇文章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战斗的光芒，对于我

们深入批判林彪一类骗子鼓吹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有很大的启示和教育。林彪一类骗子大肆叫嚷：“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完全是采用折衷主义的惯技，混淆视听，为剥削阶级的“英雄”争历史地位，否认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否定群众斗争造就英雄人物。正如鲁迅早已驳斥过：“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论，实际上是反动的“英雄史观”的变种，是林彪一类骗子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理论纲领。这篇文章还揭露胡适在“整理国故”旗号下引诱青年钻进孔子破庙里讨生活的罪恶目的。林彪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打着尊孔的旗号是有其反动政治阴谋的，我们要学习鲁迅反尊孔的革命精神，揭穿林彪一类骗子的尊孔的险恶用心！

《記 念 刘 和 珍 君》

本篇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续编》。

那时是“五卅”运动以后，北伐战争的前夜。“五卅”运动所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给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随着北伐战争的即将到来，反动统治者十分恐慌，积极策划反革命阴谋。在一九二六年初，上海买办阶级就召集反动官吏和十二个大学校长谈话，要他们严禁“学潮”，强迫学生填写不参加游行示威的“誓约书”。在北京的反动头子段祺瑞和内阁厅长贾德耀也先后宣布，谁要是参加游行，就杀掉谁；并且还进行整顿学风。由此可见，反动统治者已经下了狠心，准备用刀枪制造血腥惨案，妄图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同时，帝国主义也向革命势力发动猖狂的进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京、天津等地工人运动、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都在蓬勃发展。一九二五年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受到群众革命斗争的影响，逐渐地倾向革命力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殖民地的秩序，首先派兵开炮袭击大沽口的国民军，于是美、英、日帝国主义立即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五项无理要求，限定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以前答复，否则，他们就要自由行动。事情很清楚，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看到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而进行的挑衅和威胁。

三月十七日，北京各团体代表齐集于当时北洋政府国务院，一致反对投降政策，要求烧毁通牒。对于爱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反动头子段祺瑞不但不答应，而且下令早已准备好的“府卫队”利用刀枪镇压群众。代表们以自己的鲜血，表明了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意志。

消息传来，群众更加愤怒，三月十八日上午，刘和珍怀着无比愤激的心情，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率领同学们在寒冷刺骨的清晨，加入以工人为领导的四千人战斗队伍，浩浩荡荡地奔向天安门，游行队伍高呼“坚决反对段祺瑞卖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权”等响亮口号，反映出了中国人民热血沸腾的声音。卖国贼段祺瑞恼羞成怒，大下毒手，突然开枪射击，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大惨案，四十七人被残杀，二百多人受伤，刘和珍等人也遇害。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们，还用尽各种下劣的手段，迫害其他革命者。

在这危急关头，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鲁迅，以不畏强暴凶残的硬骨头精神，投入了这一场爱国运动，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卖国贼和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他以悲愤和敬佩的心情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愤怒地声讨和揭露了北洋军阀的滔天罪行及无耻咀脸。同时，对北洋军阀的帮闲文人，即以《现代评论》派为代表的“正人君子”胡适、陈西滢之流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文章充分表达了鲁迅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精神。

文章揭露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罪行。“三·一八”事件中爱国青年为了反对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竟然遭到

残酷的镇压。鲁迅痛斥他们：“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鲁迅还愤怒地揭露北洋军阀反动政府早已蓄谋构陷爱国青年的罪恶，他们胡说什么：“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充分暴露反动政府凶残的面目。段祺瑞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他们是一丘之貉，是共同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鲁迅给予无情的鞭鞑，辛辣的讽刺，他说：“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文章通过对革命烈士的哀悼，控诉旧世界和旧社会的罪恶。一开头就写道：“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鲁迅独自徘徊在礼堂外，表明他对战死者的深痛哀思。紧接着作者发出对反动统治者的控诉：“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然后作者又通过对照的写法表达了对革命烈士的崇敬、悲痛的心情和对旧社会无比憎恨的感情，文章写道：“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这一爱一憎，表现了鲁迅强烈的革命义愤，鲜明的阶级倾向，也是对旧世界旧社会有力的鞭鞑和批判。

鲁迅还痛斥反动北洋军阀的帮闲文人下劣的行径。段祺瑞政府为了掩盖反革命罪行，由他豢养的一批走狗，即以胡适、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散布了流言蜚语，为主子辩护并攻击爱国运动。“三·一八”事件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之流诬蔑革命群众“莫名其妙”，“受人利用”，“盲目自蹈死地”。鲁迅对此极为愤怒，斥责这些所谓“文人”“学者”是“有恶意的闲人”，他们的论调很“阴险”，“使我

耳不忍闻。”反动文人的帮凶行径，比起主子更有欺骗性，所以鲁迅愤慨地指出，“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却很“出于我的意外”。

鲁迅热情地歌颂中国革命妇女的英雄行为。他热烈地讚颂说：“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这是鲁迅对反动派的暴行的血泪控诉，也是他对烈士为革命而献身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的高度讚颂。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将教育和鼓舞千千万万的革命人民起来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革命的洪流将滚滚向前，加速反动派的灭亡。

文章的最后，鲁迅告诫人们，黑暗的旧世界、旧社会，是由几千年封建势力和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所造成的。他号召人们用战斗来结束这“非人间”，真正的革命者将在革命的大道上“更奋然而前行。”

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加深人们对烈士不可磨灭的印象，使烈士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文章着重描写刘和珍的形象，一开头写道：“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鲁迅还写道：“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这短短的两句话里就充分表明了她追求真理的理想。鲁迅着重通过她同反动势力的斗争来表现她英勇的性格，例如，“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那时她们被“强拖出校

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对刘和珍的反抗行动，鲁迅称赞说：“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鲁迅还赞扬她一心为革命事业的崇高思想，当革命学潮被暂时镇压之后，学校恢复旧规，她心情极不平静，鲁迅写道：“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由于她对革命有一颗火热的心，所以她在敌人面前，勇往直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章节明晰。文章开首交代写作本文的动机，结束写革命青年牺牲的重大意义，中间部分回忆英雄生平事迹以及作者哀悼和铭记之情，并以事实揭露敌人，这样安排增强文章的战斗性，生动性，感人至深！

今天学习鲁迅这篇文章，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鲁迅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学习这篇文章，将会进一步激发和增强我们对中外反动派的刻骨仇恨；懂得今天革命之胜利，是我们千千万万革命者，在我们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流血牺牲和百折不挠的斗争而换来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当前国内外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绝不能放松革命的警惕性！

《写在“坟”后面》

《写在“坟”后面》这篇文章是鲁迅在厦门为《坟》这部杂文集写的后记，作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那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深入发展的时期，我们党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把革命推向前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异常，我党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那时，以共产党的《响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文化战线上的走狗，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破坏从来没有停止过。鲁迅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执行党在这个历史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任务，同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学衡派”、“甲寅派”，批判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在文化上的代表“现代评论派”，取得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巨大胜利。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急剧发展，阶级斗争不断深入，鲁迅深感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战斗的要求，他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上的弱点，他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思想上的矛盾，要求掌握新的思想武器，以便跟上新的革命形

势。

《写在“坟”后面》这篇文章总结作者“五四”以来到一九二六年的战斗经验，重申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表明鲁迅不断解剖自己，改造世界观的革命要求，反映了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观向共产主义者世界观转变前的思想真实面貌。

鲁迅以血的教训总结了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是这篇文章的显著特点。鲁迅善于识破阶级敌人的假面，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充分认识敌人的反动本质。当革命形势发展壮大，反革命力量低落的时候，敌人便采用种种手段妄图保存反动势力。新文化运动开始勃兴的时候，反动势力拼命破坏，“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鲁迅尖锐地指出，尽管他们三番五次见风转舵，耍弄折中调和的手段，但他们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以伺机反扑。因此对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要有充分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上当！

长期同形形色色的敌人斗争中，鲁迅总结了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痛打落水狗”。他沉痛地指出，论“费厄泼赖”这一篇，是用“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鲁迅深刻地认识到阶级敌人的本性，因此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在原则的问题上是决不妥协的。他说：“真的猛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对敌人他从来不畏缩，妥协。当敌人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时候，鲁迅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

革命精神，写出匕首般的杂文，粉碎敌人的进攻；而当敌人处于不利情况，施出“带住”之类的烟幕，以便掩迹逃遁，伺机反扑的时候，鲁迅从不上当，而是继续举起投枪，揭穿敌人的阴谋。他明确地表示：活着“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坟〉题记》）他指出：“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他谆谆告诫青年革命者，在对敌斗争中“不能一味‘费厄’，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有坚韧不拔地进行战斗才能夺取胜利。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鲁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战斗的要求，充分表现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这是这篇文章另一个特点。他因为暂时找不到明确的革命出路而产生苦闷心情，他说：“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他感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戮杀”，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回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依然执着战斗，不断探索前进。当时由于反动军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北京来到厦门大学，他在自己尚未明确革命出路时，未免感到有些“淡淡的哀愁来袭击”，但是为了“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还要说几句话”，“虽然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鲁迅坚决表示：“失望无论大

小”，“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给那些“一心一意造选自己舒服世界”的人，“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

鲁迅可贵之处还在于，在革命实践中，重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集杂文而名之曰：“坟”，就是表示他要彻底埋葬“旧我”，与一切旧的东西作彻底决裂的决心。他说：“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阶级，他看到了自己“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年轻时候又进过洋学堂，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受过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坚决战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执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但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由于出身阶级的负累，旧思想不断袭击，影响了他的前进步伐，他深深感到必须自我改造，抛弃旧思想，追求新思想。他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又说：“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鲁迅这种勇于自我改造的革命思想是他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不可缺少的条件，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写在“坟”后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鲁迅在现实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下，逐渐看到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的真